

在杭州触摸兴盛于长江流域的古老雕版印刷技艺—— 一把刻刀，雕琢千年光阴



黄小建正在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一方桌子正对窗户,光线明亮。其上放着切割垫板、梨木板、十几把刻刀,四处散落着木屑……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三路来到了杭州雕版印刷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黄小建的工作室,连同他的儿子黄捷成,这里一共4个同事。

雕版印刷术是中国人最著名的发明之一。这门古老的技艺,诞生于9世纪末唐五代时期,以杭州和成都——长江流域的两座大都市为发展中心。1000多年后,在杭州,黄小建用雕版印刷术创作了《湖山胜概》《唐女郎鱼玄机诗》《一叶西湖》等作品,以古老的技艺讲述着文明的历史。

雕版印刷进入大盛时期是在宋代,以长江流域为最。长江上游的成都,诞生了以官方刻书为特色的蜀刻本。《太平御览》《册府元龟》《太平广记》《资治通鉴》等大部头官修史书都在成都刊刻。

顺长江而下,杭州是另一个中心。“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这是有记载的。”说起雕版印刷这门技艺的历史,黄捷成如数家珍。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的他,师从艺术史学家范景中。毕业后,他拿起刻刀,继承了父亲黄小建的事业。

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雕版印刷业独领风骚,诞生了众多瑰宝,传承至今。廖莹中世禄堂本《昌黎先生集》、临安陈宅书籍铺刻本《唐女郎鱼玄机诗》等书籍,流传千年不坏,至精至美,现为国家图书馆的镇馆之宝。

宋代长江流域雕版印刷——尤其是杭州,何以如此之盛?在黄捷成看来,除雕版技术之外,优良的纸张和墨是另一个重要因素。随着造纸技术发展,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出现,而长江流域尤其江浙一带盛产竹子,北宋米芾就盛赞过湖州竹纸。徽州墨也为长江下游雕版印刷业提供了质量保证。明代以后,人们仰慕宋版书“墨色如漆”,千年不褪色。

越州纸、徽州墨……长江下游地区在隋唐以后成为全国经济中心,文化事业繁荣,市场需求巨大,一流人才汇聚,再加上盛产上好的纸墨材料,自然成为最大的刻书中心。

宋代雕版印刷的巅峰代表,临安陈宅书籍铺的《唐女郎鱼玄机诗》占一席。这部作品刀法精到、墨色晶莹、欧体字清秀婉约,曾在国家图书馆的馆藏精品大展中亮相,与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文

津阁《四库全书》等共同展出。黄小建也曾致敬,亲手刻过一版。上世纪70年代末,20岁出头的黄小建进了浙江美术学院(今中国美术学院)的水版水印工厂,跟着老师傅学习雕版、水印等技术。

后来工厂撤销,但黄小建一直没放下这门技艺,还去南京、扬州、天津等地向老师傅学习,逐渐融合了各地的刻印技艺。2003年前后,有几个藏书家找上门

来问:这本书能不能刻?黄小建一看,正是复印的《唐女郎鱼玄机诗》。于是他先刻了一段文字,对方经过一番对比,说可以。

《唐女郎鱼玄机诗》字体是清秀的欧体小楷,黄小建先是一笔一笔“复制”下来。因为雕版的第一步,就是把文字、绘画在纸上描下来,再反贴到木板上、下刀。黄小建学习山水、花鸟绘画和书法多年,“我还是有点功底的。”他说。六个月后,刻完了,中国美院范景中

教授为本书写了题跋,黄小建一并刻板付印。可惜的是,2021年邻居家失火,殃及黄小建的房子,这批书版付之一炬。这一版一共只印了七八十部,藏书家们私下收藏、赠送。

2009年起,黄小建闭关六年。他的目标是复刻《十竹斋书画谱》。刊刻这部作品的明代徽州商人胡正言使用了“短版”(后衍化成近现代的木版水印)技术,这是一种多色套印技术,将一幅画分成多

块木板,相同颜色部分在同一块板上。这种技术的出现,使得彩色印刷成为可能。

黄小建每天6时30分起床,一天里除了吃饭就是在雕版,一直到晚上10时30分睡觉。六年后,2000多块印版,复刻终于完成。“那是我凭一己之力,从头到尾完成的,是对一个人毅力的考验。”黄小建说。

2018年,黄小建着手复刻《湖山胜概》。这部诞生于晚明时期的作品,以诗书画相结合的方式,呈现了当时杭州吴山上的“十景”。黄捷成的介绍最通俗——那是明代关于杭州的“小红书”,分享美景和旅游攻略。

《湖山胜概》只有12张图、70多块木板,但画面细致,笔触像头发丝一样多而密,不仅刻起来难,印起来也很难。历时2年多,黄小建才最终完成。

随后,黄小建又把目光投向《十竹斋笺谱》。明代刊刻时,胡正言运用了“短版”“拱花”两项技术。“拱花”是一种不着墨的雕版印刷方法,以立体凸起的线条表现花纹,与画面中的花草虫鱼相映衬,惟妙惟肖,但几近失传。

黄小建第一次见识“拱花”,是2008年西泠拍卖会上的一本由北京荣宝斋于新中国成立前刻的《十竹斋笺谱》。当时他震惊了:“雕版印刷技术曾经达到这个地步,不得了。”反复试验、反复失败,直到从石碑拓印的方法中,黄小建想到了干印的方法,最终在7年后再现了《十竹斋笺谱》的“拱花”。

黄捷成说,明代“拱花”这一技艺在不同城市之间流传,展现了长江流域各个城市之间技术交流的频繁,也展现了雕版印刷技术在明代晚期走上了一个高峰。

从宋代到今天,一千年来,雕版印刷技艺在黄小建父子这样的匠人手上代代流传。一把刻刀、一块梨木,雕刻着长江水一样漫长的时光。(本报记者 宋浩)

探访抗战时跻身中国文化中心的小镇—— 李庄,在乱世中安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抗战时期,战火纷飞,何处才能安放下一张安静的书桌?

中国四大抗战文化中心,其中的重庆、成都、昆明,都是位于长江中上游流域的大城市,成为提供庇护的大后方,但日机对这些城市的袭击越来越频繁,威胁日益严峻。

1941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连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中国营造学社等学术机构,与驻昆明的同济大学一道,开始了一次大规模的迁徙,目的地是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

李庄是四大中心唯一的镇。但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国际邮件只要在目的地一栏填上“中国·李庄”,这份邮件就一定能够寄达。

秋晨晨雾尚未完全散去,自宜宾沿长江东行,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一路也被“投递”到了李庄。

1941年,同济师生们是第一批到达李庄的“下江人”(指长江下游地区来的人),占尽先机。南华宫住进了理学院,紫云宫成了图书馆,工学院在东岳庙敲响上课的钟声。

我们去的当天,趁国庆假期错峰出游的贵州人陈先生,正从同济大学医学院旧址走出来。

“喜欢这里安静的气氛,是一个古镇该有的样子。”他边说边打量偌大的院子,大概还在回想刚刚才知晓的一段往事——当年医学院借天光在院子里进行解剖教学,把正在修屋顶的瓦匠吓得不轻,“下江人吃人”一下子在镇上传开了。同济大学干脆在李庄办了一场人体科学展,谣言自散。

李庄的“九宫十八庙”、祠堂、会馆成了学生上课、机构搞研究以及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存放数百箱国宝级文物的地方。

学生们大多与百姓同住,先生们因先来后到,居住条件也不尽相同。古镇有一条窄如羊肠的羊街,直直横横。我们路过一处低矮的木门,上着锁,路人告诉我们,陶孟和曾在里面住过。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是最迟到达李庄的机构,所长陶孟和跑断两条腿,才在距庄五里地的门官田找到一处庄院院落作为机构驻地,每天满头大汗奔走于两地。

在羊街打横处几步开外,我们找到了李济曾经的居所。李济在李庄时,正沉浸在亡国的巨大哀伤中,甚至想辞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和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之职,但最后仍放不下,艰难支撑。而他的学生吴金鼎与夏鼐,考古界

的两只学术“大鼎”和同样留洋攻读过考古专业的曾昭燏,三人开始了彭山汉代崖墓的田野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

历经艰险,颠沛流离,弦歌不辍。这就是当时的李庄。前来访问的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作者)也没料到,竟在这一处偏僻山坳里,遇到一个坚韧不拔、满怀热情的科研群体。

我们去寻找生物学家童第周做实验的地方,当年他住南华宫附近,现在还留存一面门楼。李约瑟拜会他时曾惊讶问道:“你就是用这样的器材,在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样高难度的实验?”

我们还去探访位于李庄郊外月亮田中的中国营造学社旧址,那是一座典型的川南民宅,里面无论是学社的办公室,或是学社成员斗室般的宿舍都保存完好。林徽因长卧病榻的房间,与老照片上一模一样。她就躺在帆布行军床上,与李约瑟闲聊两句时,梁思成正在院子里杀鸭子招待贵客……

在李庄的6年,董作宾完成了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扛鼎之作《殷虚书契》,梁思成完成了英文及图文版的《中国建筑史》,童第周开始了中断多年的“金鱼实验”,在脊椎动物、鱼类和两栖类动物的卵子发育研究方面取得了有世界影响的研究成果。

席子巷,是李庄另一条保存完好的老巷,因隙席避雨之需,屋檐做得特别出挑。

当年,有许多学生就挤住在在这里。原本三千多人口的李庄古镇,不知道是以何种方式,安置了上万之众的“下江人”。当那些学生、先生们,背着背包,提着行李,潮水一样涌来时,说李庄人不震惊、不为难是假的。

但在山河破碎之时,他们仍以无比的热情、耐心与诚意,接过重担,也让李庄从此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深刻的标记——中国文化的折射点、民族精神的涵养地。

如今,作为历史文化名镇,李庄同样迎来了潮水一样的游客。在今年国庆长假,这座古镇日均游客达6万人。李庄,又该如何消化?

我们注意到原老镇的郊外,也就是中国营造学社旧址所在的月亮田区块,在留出大片自然风光的江景和田园之外,建造了博物馆以及具有食宿功能的建筑群,一派水乡小镇风情。

“月亮田在规划之初,就定下了保留田园和江景的自然风光基调,与主打历史风貌的老镇互为补充。”李庄古镇景区管委会规划保护部部长严静说。

严静告诉我们,目前李庄保存完整的明清街巷有18条,不可移动文物95处。

在李庄,本地居民因房子陈旧需要修缮,是有特别要求的,“我们要求以古法修缮,保持原有风貌。”严静说。

当年的李庄给每个“下江人”安顿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而今它完好存放着这一段历史,等着你走人这本翻不完的书。

1946年10月的一天,几艘货轮拉响汽笛,满载着文化精英和大批国之重器,顺滚滚长江而下。李庄乡民送行,万人空巷。

如今,我们沿江一路慢行,蒹葭秋风里,码头旧址仍在,长长的石阶通向江边。大江东去,一路历经险滩急弯无数,但始终不屈不挠奔腾向前。这也是中华文化亘古不绝,生生不息,绵延至今的答案。

(本报记者 李蔚 张迪 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李庄码头旧址至今仍有游船停靠。

本报记者 张迪 摄

走进贵州龙场镇的溶洞找寻中国心学高峰—— 一个浙江人的异乡顿悟,影响世界



位于贵阳修文县的“玩易窝”。

本报记者 戴利强 摄

王阳明是明代杰出的思想家,他创立的阳明心学提出了“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等观点,对中国、东亚乃至整个世界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远在三千里的贵州省贵阳市修文县龙场镇一座小山丘下,一个天然小溶洞也因他而闻名。500多年前,浙江人王阳明被贬于此,将这个溶洞取名“玩易窝”,赋予了它不一样的意义。

长江文化考察队第二路队员很难想象,眼前这个高3米、最宽处4米、深20余米的阴暗潮湿的洞穴,能与阳明先生笔下的“玩易窝”关联起来。

“阳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窝而读《易》其间。始其未得也,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无微,茫乎其无所指,子乎其若株……”王阳明所写的《玩易窝记》短短三百余字,清晰地记录了他在此洞内读《易经》悟道的过程,洞名也由此而来。

在贵州龙场阳明文化园,我们与这位故乡大儒的雕像对目而望,最先想到的还是那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者误也”,以及历史上著名的“龙场悟道”。

王阳明出生于浙江余姚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王华是明成化十七年(1481年)状元,在京中担任高官,三朝元老。他自小才气逼人,有“成圣”的宏愿,考中进士之前,交往的人物已都是

文坛大家与政坛显要。但后来,王阳明因反对宦官刘瑾,被廷杖四十,谪贬至贵州龙场当驿丞。

彼时,“龙场万山丛薄”,属于未开化地区。从权力中心到蛮荒之地,如何生存下来成为王阳明当时最紧迫的事。他在书里曾写道“我一日有三死”,有狼虫虎豹,有魑魅魍魉,以及官府迫害。

对于家境显赫的王阳明而言,到了这样一个地方有充分理由怨恨,但他却没有。面对巨大落差和困顿生活,王阳明并未消极,而是日夜反省自己的经历和学问,同时开化教导当地人,换得当地老百姓的真诚回应。就是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王阳明忽然有所顿悟,认为心是感应万事万物的根本,由此提出“心即理”的命题。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到另一处洞穴——同样位于修文县龙场镇的阳明洞,它与玩易窝在2006年一起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洞原名“东洞”,我们踏过洞口青石板铺就的石院坝,迎着青石雕刻的护栏,看到院北石梯两旁各屹立一棵需两人合围粗的参天古柏,名“文成柏”。据相关记载,古柏是王阳明手植,距今已有500多年。当年,王阳明在此创办龙岗书院,为当地老百姓授课,小小陋室时常能容纳两百人围坐于此。口耳相传,后人将此洞称作“阳明洞”。

在中国明史学会王阳明研究分会理事、修文县阳明文化研发中心理事长谌业军看来,王阳明之所以会在所谓的蛮荒之地悟道,离不开“天时地利人和”,“巨大落差被逼回归本心,现实生存环境的艰辛,以及接触到当地的淳朴民风。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王阳明再读程朱理学和易经时才能参悟,‘龙场悟道’标志着王阳明心学思想的成熟。”

在“龙场悟道”过程中,王阳明还提出“知行合一”的重要观点,强调知识与行动的统一,反对空谈理论而不实践的行为。同时,他也重新解释了“格物致知”的概念,认为通过内省和修养来实现“致知”,这里的“知”便指良知。而其进一步发展的“天人合一”理念,更是要求人在行动和思想上要达到和谐统一的状态。

王阳明在贵州悟“心学”,而王阳明也深刻影响了这里的教育、政治、军事、经济等方方面面。谌业军说,阳明先生未到贵州之前,这里只有两人曾考取进士。他离开后,贵州考取状元两个、探花一个、进士700多人、举人6000多人,“其中修文县就走出了22个进士”。

时至今日,在修文县的校园课堂里,孩子们会诵读阳明先生著作,接触阳明文化。在朗朗读书声中,阳明文化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本报记者 李沐子 戴利强)